

#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对社会学的呼唤

赵 宜 胜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群。移民动迁的动力问题、迁出地与迁入地群体之间交互作用关系问题、移民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转换的适应问题、移民的心理问题,以及改革与社会变迁对移民在动迁中较大期待值的制约问题等,大量的移民问题不仅在近期对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造成了影响,而且还存在着继发社会问题的潜在因素,单纯依靠行政的力量难以解决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它呼唤着社会学的积极参与。

作者:赵宜胜,男,1957年生,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管理系讲师。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一项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航运、调水等综合效益,对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具有战略性影响。然而,因它的兴建而引起的移民问题,也成为这项工程能否顺利兴建、能否很好地发挥效益的关键问题之一。

移民问题既是历史上频繁出现的老问题,也是不断出现新的特点的现实问题,它是社会学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根据1986年以来对三峡地区的多次实地调查撰成此文,以期引起社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 一、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概述

按照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报送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意见,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为175米,回水淹没区涉及四川、湖北两省的19个县市,全部或部分淹没2个县级市、11个县城、140个集镇、326个乡、1351个村,需要迁移人口将超过100万人。按照1985年底的统计,在淹没区需直接迁移的人口(不含安置区二次征地移民)72.55万中,农村人口33.26万人,占46%,城市、集镇人口39.29万人,占54%。

就农村淹没区而言,农村移民在移民总数中所占不到一半。而由于水库是沿峡谷干支流延伸的河道型水库,使淹没区呈带条状,移民分布在自干流湖北宜昌三斗坪镇(坝址)至重庆附近的巴县木洞镇之间566公里的狭长地带,39.29万农村移民则分散在19个县市所属的326个乡,1353个村,5269个村民组。统计结果表明:在库区各县市,移民人数在1万人以下的县市占一半以上,一般均未超过3万人;受淹耕地占各县市耕地的比率,1%以下的有7个县市,其余各县市一般未超过5%。基于这种移民相对分散、全部被淹的村组极少、移民在各县市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分布特点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移民规划先后提出了“就近安置”、“就地后靠”、“离土不离乡”、“发展大农业”等原则性意见。

鉴于过去水库移民以一次性经济补偿为主的做法不能根本解决移民安置问题，从而遗留下许多后遗症的教训，中央提出三峡工程实行“开发型移民”的方针，即“利用必要的移民投资，帮助移民开发本地的丰富资源，创造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出路。”

正是在上述原则性意见和“开发型移民”方针的指导下，库区各县市做了大量移民前期工作，逐步形成了库区各县市的移民初步设计规划和一批移民开发试点。

## 二、移民试点提出的问题

提出“开发型移民”方针，改变过去单一性、补助性、一次性的包干方法为现在整体性、增殖性、滚动性的开发办法，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三峡工程移民虽然有了“开发型移民”的提法，但其内涵并非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甚至到今天，这个问题并未彻底在认识上得到解决。回顾三峡工程开发型移民试点，不妨将其实施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86年，这是在与三峡工程相关省的筹备工作期间，用中央划拨的2000万元试点经费在库区各县市办了一批移民试点项目，主要是工业项目。对经济发展条件极差的三峡地区来说，这笔资金的注入无疑是有诱惑力的。当时人们一般认为只要能上项目就能实现资金的积累和财政收入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移民安置就业问题的解决。有的地方在缺乏必要的论证和相应的生产经营条件或措施的情况下，上了诸如酒厂、丝绸厂等工业项目，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这些项目后来均未得到很好的发展，有的甚至跨掉了。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上得准经营得好的项目，如万县市日用化妆品厂、云阳县摩托车配件厂、巫山卷烟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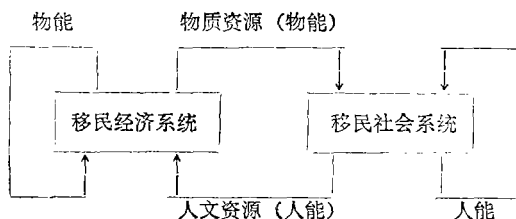
第二阶段：1986年—1991年，这是在三峡工程转入重新论证阶段，由三峡省筹备组改组的“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继续组织实施移民试点工作，将中央划拨的每年2000万元经费继续在各县市兴办试点项目。在这一阶段，第一阶段工业试点的一些问题已经反映出来，开始把试点的重点转向农业安置方向，提出“以农为本，多种经营”的方针。此间还展开了三峡地区移民安置环境容量的研究和讨论。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受到来自自然生态方面的制约，认识到“办工业的风险性”，由于移民文化科技素质差、项目选择不准、管理不善可能导致工业项目的失败。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举”思想的指导下，一批柑桔园和茶园在峡江两岸的荒山上诞生了，比较出色的有云阳县宝坪乡移民联办果园场、巴东县雷家坪移民柑桔园、秭归县水田坝乡移民试点果园和宜昌县太平溪移民试点茶园、长寿县长寿沙田柚园等。单从项目本身看，这些项目的兴办使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科学文化知识在农民中的传播和农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同时，这些分布于长江干支流两岸的果园，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成为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的组成部分。但是，若从“开发型移民”的目标来看，这些项目仍然停留在以经济办法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阶段，尽管比起第一阶段，比较能注意到经济项目的直接制约因素，但总不能突破单一经济思路的局限。譬如：认识到要发展柑桔生产，就必须加强对移民的柑桔栽培技术培训（如巴东县开办了移民柑桔技术培训中心），但对于从柑桔生产到移民安置这个复杂链条中的若干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又如奉节县分户饲养奶牛试点问题，在试点前看来收益很高的奶牛饲养业，到试点后却因牛奶产量陡增使销售遇到困难，组织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经济项目的开发受到当地消费水平、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和食品加工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

第三阶段：1991年一现在，随着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的完成，人们对于工程效益和移民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深化，认识到三峡工程的兴建应该促进三峡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这种促进是以“开发型移民”为契机的。换句话说，三峡工程除了其诸项工程效益外，还应有一项“移民效益”。而“移民效益”的实现，有赖于工程移民问题被作为三峡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纳入经济社会系统总体规划之中。这种认识不仅见于这一时期的领导人讲话、移民文件、研究论文，也在库区某些县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土规划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甚至在移民群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认识。云阳县宝坪乡移民联办果园场一位农民谈道：果园在我们这偏僻山乡兴建，使全乡农民从果园兴建工程获得了工副业机会，还学会了柑桔的科学栽培技术。他甚至使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词汇作为谈话的总结。

然而，关于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总体的重要性和被动的效益评价上，用科学的社会理论和方法指导移民规划及其实施，不仅在实践上还没有开始，甚至在认识上也是远远不够的。

### 三、社会学的任务

以上陈述和分析业已表明：移民过程应该是移民经济系统和移民社会系统的功能耦合：



移民经济系统以“物”为目标组织起来，输出“物质资源”，其中一部分供给移民社会系统，如移民规划在经济方面必须考虑许多非生产性投资和非赔偿性投资；另一部分用于移民经济系统本身维持自身的发展，如移民规划在经济方面所主要考虑的生产设施的恢复、产业项目的安排等。

移民经济系统以“物”为中心组织起来，输出“人文资源”，其中一部分供给移民经济系统，如移民的价值观、知识、风俗等人文因素对产业安排的制约和影响；另一部分用于移民社会系统本身维持其自身的发展，如价值观、知识、风俗等人文因素对移出居民与移居地居民的融合产生影响。

由此看来，不仅过去以离散式一次性经济赔偿办法解决移民问题是单纯的经济解决办法，而且目前这种在没有科学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方法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区域经济规划”和移民试点，也仍然是偏重于经济方面而缺乏综合整体性特征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一些成功的移民试点中看到一些社会方法的不自觉的运用，从一些重要的现象中看到移民社会系统对移民过程的基础性影响，科学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方法之引入，已作为紧迫的任务摆在社会学界的面前。

#### 1. 寻找移民动迁的动力

说服或促使移民搬迁，是移民工作的基本任务，但从来都是移民工作最困难的环节。无

论是否有细致周密的安置规划，是否有打动人心的前景承诺，对于三峡库区的移民来说，使他们答应搬迁绝非易事。在三峡坝址附近，有一个叫东岳庙的村，有部分村民被要求搬往未来跨江大桥桥头附近，以便使那里形成集镇，但无论移民干部如何说明安置区的前景，村民们就是不愿搬迁。

这些村民不愿搬迁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能等找出这些原因并一一找到解决办法后再行动员搬迁。必须超出这些原因寻找一个现实的办法，即找到移民动迁的动力。换句话说，对于水库移民这类非自愿移民，不可能将其完全转化为自愿移民后再行动迁，而要寻找一个外在的动力促使其动迁。例如，当年葛洲坝工程移民动迁的动力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组织（农村社队）的强大作用；我国北方曾有利用农村遗存的宗族力量促使水库移民动迁的例子；另一种曾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蓄水一到，水撵人走”的被动动迁。然而，对于今天三峡库区的移民群体而言，既缺乏当年那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组织作用，至于宗族力量，也趋于衰微，而“水撵人走”更是应避免出现的。那么，那些对移民动迁显得力不从心的乡镇组织，可以到哪里寻找到可资促使移民动迁的力量呢？

巴东县在雷家坪村以贷款建立移民柑桔园试点之初，村民们并不很积极，但随着该村一组几位农民从新开田里逐渐得到收益，特别是当一位柑桔能手的柑桔获得丰收并获得明显经济效益的时候，村民们禁不住争着向移民局要贷款，甚至四处集资到移民安置区开荒建园。随着柑桔园生产管理任务的加重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有些移民主动把新房盖到地处淹没线上的柑桔园附近，以方便对柑桔园的管理。目前，该村一组的大部分家庭都已在淹没线以上盖了新房。显然，他们的搬迁完全出于自愿，是搬迁与致富的一致。认识到这种一致，不是移民干部苦口婆心的劝说，也不是移民理解了移民规划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而主要是群体中有影响力的致富能手的示范。在这里，应该为三峡工程作贡献的要求与移民的致富需要相一致，所以社会组织的目标通过社会群体内部的运行得以实现。这对于离蓄水尚有十余年的三峡工程移民来说，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 2. 移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按照开发型移民以贷款投资兴办产业实现滚动增殖的设想，生产的集约化将是移民生产安置的主要方向，如在试点中看到的各种种植业、养殖业基地和工厂，但在这个方向上可能会遇到困难和阻力。

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这一带的农民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庭院经济”模式。农民们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独门独户在包给自己的耕地、山地和房前屋后种植适宜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各种果树，并配套发展家畜和水产品。这种模式曾被作为川东鄂西农民致富的有效模式加以总结和推广。显然，在部分耕地和山地被淹，人均占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庭院经济”受到条件的限制，那么，多年形成的独特的生产方式，能在短期内得到转换吗？从目前大多数移民的心态看，他们是不愿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而被抛向集体生产单位的。

在距三峡坝址下游不远的抖船沱，有一排新建的移民住宅。按计划要在这里建6个居民点，现已建一处，系二层楼公寓式，4户一组，每户设内楼梯，占两层楼，户户相连。目前，拟迁往此地的移民大都表示不满意，除因目前位置较偏、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这些将随着工程的兴建和移民开发全面铺开而改观）等原因外，这种户户相连的公寓式住宅，很不符合当地居民单家独户、自成体系的居住习惯，也不利于他们在住房周围开辟属于自家的不易

受侵扰的菜园子、果园、鸡圈、猪圈、鱼塘等设施。

所以，生产安置规划不单是产业项目设置等经济学的事情，应让社会学参与对移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

### 3. 移民心理问题

伴随着移民工作的展开，在移民群体中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心理现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这一地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移民心理现象进行必要的归纳和分析，从而对那些影响移民动迁和移民安置的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是库区各地各级实施移民计划的干部共同的呼声。关于移民心理现象，这里仅举如下三例：

#### (1) 远迁恐惧心理

三峡坝区一带离葛洲坝很近，葛洲坝库区移民时，这一带曾有部分移民远迁到100多公里以外的枝江县董市镇。如今，三峡工程淹没线又涉及到这一带剩下的居民，在他们中间，仍对当年葛洲坝库区移民远迁枝江心怀恐惧。秭归县茅坪镇一位青年农民说：“我们这一带是山区，适于柑桔、茶叶、草药等作物的生长，远迁枝江，会不适当当地以水稻、小麦、棉花为主要作物的大田耕作，也不习惯那种因缺木柴而以稻草、棉梗、麦梗为薪柴的生活方式。”甚至从三峡坝址迁往下游仅10公里远的地方，移民都不愿意。然而，形成这种远迁恐惧心理的原因不只是上述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如“留恋故土”的信念等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 (2) “三峡情结”

这是三峡的移民们对三峡工程的一种矛盾心理，以坝区一带（如三斗坪、茅坪）为最甚。一方面，移民们热情欢迎三峡工程上马，盼望三峡工程早日动工。作为将蒙受搬迁之苦的移民，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诚欢迎工程的上马，这在世界水库建设史上都是罕见的，正如三斗坪镇一位中年农妇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所说：“我们欢迎工程在这里兴建，因为工程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另一方面，移民们对于向远离坝址的高处搬迁，又是很不情愿的，一句流传很广的歌谣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心理：“想三峡，盼三峡，三峡来了要搬家！”

#### (3) 期待失衡

在坝区一带还流行着另一句歌谣：“想三峡，盼三峡，三峡来了还种田！”这反映了坝区移民们在盼望三峡工程时所积压的一股强大的命运变迁期望，一遇三峡移民关于“就近后靠，以农为本”的计划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落。例如，按照移民规划，秭归县城将搬往茅坪镇，这使不知详情的农民兴奋了好一阵，但冷静下来后发现，在随着迁城而大量涌入的城镇人口中，自己可能仍将是个农民，不仅不能从本地地位的提升中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反而可能使昔日平静的生活被人们的排挤和歧视搅乱。如何才能使移民们走出期待失衡的困境呢？

### 4. 社会转型与移民适应的问题

宜昌县太平溪移民试点茶园在成立初期曾接受移民开发资金4.5万元，经过几年的开发，已迅速发展为省级先进乡镇企业，接收安置的移民数已大大超过移民局下达的指标。但是，该公司经理谈到了他今天面临的困惑：从移民生产安置的角度看，移民在土地被淹的情况下被招工进厂，工厂应保证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企业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又不得不对内强化管理、精减人员，连茶场原有的普通职工都面临着打破“三铁”的可能，那么，移民工为什么不能与普通职工一样，承受被解雇的风险呢？

从当前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的客观环境来看,各种关系和政策都处于不断变化与调整中,我们无法使移民群体孤立于这个环境之外而不受关系调整与政策变化的影响。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很不平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的自觉。对处于因工程兴建这一外来因素冲击而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的三峡移民而言,社会变迁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三峡工程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农转非”、“正式职工”之类可以使社会地位及生活境况得到提升的机会,然而,面对正在飞速变革的劳动人事制度、城市价格体系和社会福利政策,移民们即使实现了“农转非”、“正式工”的愿望,“好处”还会不会如当初想象的呢?

如果移民不再被分给土地而进厂当工人,移民的安置工作是否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遗留问题”了呢?

#### 5. 新老居民融合与社区重建问题

在庫区各县进行垦荒造田移民的过程中,移民干部们都感到土地归属问题的难解。因为,垦荒是在原归淹没线以上乡、村、组所有的荒山上进行,而开好后是为了安置淹没线以下的移民,这意味着“山下的人来占山上的地”,为了宝贵的生产资料,许多试点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争吵和纠纷。移民干部仍担心随着移民计划的实施,类似于此的诸如灌溉、生活设施的共用等问题都会遇到麻烦。

土地之争,不过是试点中所发出的一个信号。随着移民更多地进入移入地,文化心理方面的碰撞,人际关系的震荡,社会群体的瓦解,社会组织的重组,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将使社区重建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 四、结 语

从移民试点和移民前期工作的情况看来,“开发型移民”在经济上达到一定的水平是不可能的,许多成功的移民试点正不断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但移民问题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即使在经济上高度发达的地区,也不能避免社会震荡的发生。三峡地区经济的发展,不等于三峡地区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更不等于移民问题的解决。

当年,社会在评价葛洲坝工程的效益时,曾把工程所在的湖北宜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论据。同样在几年前关于三峡工程利弊之争中,工程所引起的移民问题也曾被作为一个难办的社会问题而引为反对工程兴建的一条重要质疑。可以预见,在未来关于三峡工程效益的评价中,工程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移民安置的情况也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对于长期因工程悬而不决而忍受社会发展的缓慢,而今天又因工程上马不得不作出经济的和人文的牺牲的三峡地区,若不能赋予一定的社会发展能力和较优越的社会发展指标,于情于理也是说不过去的。

社会学理应以科学的社会理论和方法为三峡地区的发展和三峡移民问题的圆满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 颀